



歐洲更需要中國的合作與支持



學者論衡
劉兆佳

5月5日至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這三個國家各自對中國都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是習主席五年來再次踏足歐洲。毫無疑問，習主席此行將有助於消弭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一些矛盾、分歧和誤解，以及加強中國與歐洲的合作關係。從象徵意義來說，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匈建交75周年、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使館25周年。無論從戰略或者象徵意義出發，習主席此行是要凸顯中歐關係密不可分，有需要加強互信和合作，不應該讓第三方勢力挑撥、離間和破壞。

然而，毫不意外地，部分美國和歐洲對中國敵視的政客和專家對習主席此行心情忐忑，傾向從偏頗視角看待。這些人一方面憂慮在德國和法國聯手推動下，中歐關係有所改善，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則有所減少。另一方面，他們卻認定習主席此行表示中國急迫要減少歐洲對中國的敵意，避免歐洲和美國進一步聯手遏制中國。因此，他們認為此時中國比歐洲更需要對方，中國必須盡力「贏回歐洲」，中國因而在中歐關係上處於弱勢和被动。更有一些人認為，此行的目的是要分化歐洲和美國。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這樣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中國領導人選擇的三站是完全合理的。出於戰略和經濟原因，中國迫切希望破壞北約和歐盟的團結。習主席正在訪問的三個國家都被視為打開西方裂痕的潛在槓桿。」

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對中國確實存有疑慮和擔憂。歐盟一方面積極與中國建立緊密的經貿聯繫，但另一方面則覺得中國的崛起對歐洲的安全和經濟帶來「威脅」。正因如此，2019年開始歐盟把中國同時定義為合作夥伴（partner for cooperation）、經濟競爭者（economic competitor）和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

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不滿中國沒有

「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反而認同了俄羅斯對俄烏衝突的敘事，並且與俄羅斯發展更緊密的經貿和能源合作，從而強化了俄羅斯的作戰能力和韌性。歐洲對中國的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尤其是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向歐洲大量出口並衝擊歐洲的製造業感到擔憂和恐懼。歐洲又認為其企業和產品比如干邑和化妝品在中國沒有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更具破壞性的，是美國為了不讓歐洲和中國走得太近竭盡全力不斷分化歐洲與中國的關係。

中歐經貿互利共贏優勢互補

俄烏衝突發生後，歐洲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更深，從而歐洲在與中國開展合作時遇到更多來自美國的阻撓。誠然，歐洲的文化和價值觀與中國存在差異，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有分歧，對中歐關係的發展確實帶來一定的困擾。不過，由於歐洲並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其向中國出口西方信仰的意圖比美國要低得多，加上歐洲沒有強大誘因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國的崛起，因此中歐基本上仍可用較理性和務實的態度開展彼此的關係。長期以來，中歐之間的經貿往來本質上是一種互利共贏、優勢互補的良好關係。縱然有着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分歧，中國和歐洲都需要對方。

從這個角度看，習主席此次到歐洲三國的國事訪問並非是中國單方面有求於歐洲，而是在彼此需要對方的情況下雙方破除障礙、化解困難和加強合作。在中國而言，當然不希望歐洲與美國一道遏制中國的崛起、為中國企業在歐洲的營運和發展施加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限制、向中國的工業產品特別是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大加關稅和利用不存在的「產能過剩」和「人權問題」敲打中國。相反，中國從戰略高度希望與歐洲開拓更廣泛和深入的經濟、貿易、文化、科技、投資、基建、氣候和安全合作，也希望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更希望在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正在崩潰之際與歐洲共同探索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

另一方面，我認為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下，歐洲也有巨大誘因強化與中國的合作。

在經濟層面，俄烏衝突沉重打擊了歐洲的經濟。俄烏衝突的成因主要是美國為了強化其在歐洲的霸權，在部分歐洲國家

的反對和有所保留的情況下悍然推動北約的東擴。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國，並聯同美國對俄羅斯施加「極限」制裁和大幅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不過，如此一來，歐洲的經濟遭受重創，而美國則乘機渾水摸魚，比如以高價向歐洲出售液體天然氣和拉攏歐洲企業到美國投資，然而卻又同時對出口到美國的歐洲產品設置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壁壘。

德國素來是歐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其所蒙受的經濟損失也極為嚴重。來自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蘇達大衛—威爾普（Sudha David—Wilp）和雅各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2024年3月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2023年，德國經濟萎縮0.3%。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警告未來情況將會是「驚濤駭浪」不斷，並預測該國2024年的增長率將僅為0.2%。」

處於嚴重經濟困難的歐洲各國，自然希望加強與中國在經貿上的聯繫來推動經濟增長和提升競爭力。以此之故，歐洲的領導人反對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鉤」，反而選相對較溫和的「去風險」一詞來描述歐洲與中國的「摩擦與合作」共存的經貿關係。這方面德國尤其積極進取。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在中德兩國慶祝建交50周年之際明確表示，與中國脫鉤將是錯誤的道路。今年4月，朔爾茨更率領一個龐大的經貿代表團出訪中國，謀求與中國加強多領域的經貿合作。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專欄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語帶嘲諷地說：「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剛剛結束了一次在語氣和實質上都更加傾向尋求與對方和解的中國之行，這種做法讓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面臨着被忽視的風險。」他更警告說：「正如中國媒體的熱烈報道所顯示的那樣，朔爾茨此行是向北京長期以來尋求分裂歐洲人以及與美國的做法送上來的禮物。這種分歧在貿易問題上非常明顯。」

無論那些對中國深存偏見和敵意的人如何冷嘲熱諷和惡意抨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儘管有着各種顧慮、不滿和猶豫，歐洲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都力圖與中國開展更多的經貿合作。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振、

國際貿易萎縮、市場碎片化、保護主義抬頭和「去全球化」肆虐的大環境下，歐洲各國在經貿上自然不能拒中國於門外。

在政治層面，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都對歐洲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前者。俄羅斯在俄烏衝突中的優勢越來越明顯。烏克蘭不單沒有奪回被俄羅斯佔領的東部地區，甚至有可能因為無法戰鬥下去而失去更多土地。對歐洲的領導人來說，作為俄烏衝突的「勝利者」，俄羅斯日後對歐洲的「威脅」會更為嚴峻。歐洲和美國對一場打不贏但卻又要無止境地投入資源的戰爭越來越興致索然，兩地民眾對繼續援助烏克蘭的態度也愈趨冷淡。

近期以來，要求烏克蘭以「土地換和平」來結束衝突的聲音甚囂塵上。不少歐洲人對美國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感到迷惘。有人認為美國不會讓衝突結束，導致歐洲要付出更大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代價。有人估計美國很快會從俄烏衝突中抽身而出，特別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而歐洲則繼續陷入泥潭之中而無法自拔。

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提出北約出兵防衛烏克蘭，遭到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對此，我的看法是馬克龍的目的其實是要向美國施壓，阻止它單方面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援，但同時又害怕烏克蘭在俄烏衝突中輸得太慘。無論如何，盡快結束俄烏衝突已成為了歐洲各國的「共識」。

在尋求歐洲恢復和平的過程中，歐洲的領導人相信中國應該可以擔當積極角色，更希望中國能夠在俄烏之間和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發揮調停作用。

從更高的戰略層面看，越來越多歐洲政治精英認為國際格局已經發生了巨變，美國霸權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無以為繼，而當前世界政治和經濟正處於混亂和失序的局面。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爾（Josep Borrell）承認：「西方主導的時代確實已經徹底結束。」他警告說，歐盟絕不能將世界分成「西方與其他國家」，因為「『全球南方』中的許多人指責我們『雙重標準』」。

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國際失序的現象感觸尤甚。他在今年5月接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訪問，以極為暗淡的態度圍繞着歐洲的各種威脅作出分析。他感嘆：「歐洲作為安全之地、繁榮和自

由民主秩序的保障者的生存受到威脅。」為了從長遠來看支持歐洲，馬克龍正在醞釀建立一個新的具有約束力的歐洲安全「框架」。「在他看來，美國不會永遠支持歐洲。歐洲大陸別無選擇。」「這項分析的基礎是觀察到沒有其他人再遵守規則了。舊秩序已被打破。目前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它。」

防範「新冷戰」符合歐洲利益

其實，博雷爾和馬克龍的觀點在歐洲政治精英中頗為普遍，但甚少人願意宣之於口。從他們的角度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崩潰，不可能通過小修小補恢復過來。世界各國特別是那些大國必須通過商議和談判來建構一個各方面能夠擁護的新國際秩序。美國顯然不會同意以新國際秩序取代其現在主導的國際秩序。如果歐洲繼續以美國馬首是瞻，則歐洲便不但失去了參與和塑造新國際秩序建設的機會，更會因為與中國和俄羅斯劇烈對抗而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因此，擺脫美國的牽制，爭取「戰略自主」和「戰略主動」便是捍衛歐洲利益的唯一出路。

事實上，雖然明知美國不高興，馬克龍還是不止一次提到歐洲要取得「戰略自主」。在構思新國際秩序過程中，強大的中國絕對不可缺席，而歐洲亦顯然有意與中國對此開展對話。法國從來都不願意對美國唯唯諾諾，而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歐洲與中國以及美國和中國的「橋樑」、「平衡」或者「緩衝」角色將會有助於提升法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歐洲各國尤其不願意看到中國或俄羅斯進行對歐洲不利的「過度」緊密的戰略合作。

總而言之，在當前動盪不安的國際大環境下，習主席此次出訪歐洲三國並明確提出中國對當前重大政治、經濟和安全等議題的立場和主張，特別是在強調歐洲和中國彼此需要對方和提升彼此的戰略互信，防範「新冷戰」、「集團對抗」和「脫鉤斷鏈」和盡快恢復中東和平等方面。在加強雙方在經濟、金融、科技、安全、氣候和文化合作等方面，習主席此行也取得了不少具體成果，為日後中歐戰略合作的不斷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原題為：歐洲和中國都需要對方）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同心同德 為良政善治作貢獻

新聞背後
梅若林

自特區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後，行政立法關係較以往得到極大改善，立法會議政效率得到極大提高，這都是市民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最近卻有議員突然「懷緬過去」，稱以往的議會模式「好玩好多」，又形容現時議會「太多一致聲音」云云。即使這番說話未必出於惡意，但實際效果卻易造成誤解甚至內部分化，對香港發展有害無利。現時正是香港踏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更需要特區政府以至立法會議員團結一致拚經濟、謀發展。

據報道，有議員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形容現在的立法會太多一致聲音，稱議員無人再提出挑戰、無人敢問規程問題、無人敢質疑、挑戰主席云云。

事實是否如此？當然不是。遠的不說，最近如政府預計在8月實施的垃圾收費計劃，就不見得90名議員全部贊成。由政府提出垃圾收費開始，到「先行先試」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不少議員都認為計劃應該再度延期或索性擱置。對於明顯有問題的政策，議員們仍然承擔起作為代議士的責任，明確提出批評和反對意見，有時甚至是火花四濺，絕非只是一味讚好。

勿曲解特首的合理質疑

即使是今年3月《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時，各委員也不是機械式地對政府的草案表示同意。合共近50個小時的馬拉松式會議、提出近2000條問題，足以證明議員並沒有選擇做「橡皮圖章」，而是由始至終秉持着應問則問、應改則改的態度。雖然議員們一致同意《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卻不代表整過立法過程完全沒有尖銳的提問和辯論交鋒。

這位的議員又稱現屆政府沒有像以往那樣容易接受批評。其舉出的例子是早前在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中，有議員曾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批評政府對港人關心不足，質疑其「親無納稅的小紅書賬戶，遠離真正納稅的香港人」，被李家超反駁以挑撥矛盾的宣傳是迂腐且危險，令人聯想到黑暴的

「軟對抗」和「反動力量」。

其實光就字面上看，當時李家超並沒有禁止議員批評政府，大多只是對有人的用詞有所不滿，同時亦有就政府對香港市民關心不足的質疑作出回應和解釋。而且換個角度想，這不正是那位提意見的議員想看到的「對撞」嗎？難道只能由議會批評政府，不准雙方有來有往才是好做法？

再者，這位議員又提到過去的立法會像「英國西敏寺式」多互動，「開心又新奇好玩，可以古靈精怪，問到很多資料」。其實，這位議員應該知道，以前那種所謂「新奇好玩」的議會文化，孕育出一堆「為反而反」、潑婦罵街式的粗鄙鬧劇，「英國西敏寺式」的議會文化，還衍生出「拉布」、肢體衝突等惡劣行徑。包括這位議員在內，不少人都親身經歷過以上種種，應該感受至深。

不能用老眼光看新形勢

完善選舉制度後，第七屆立法會也只是運作了兩年多，對於新制度、新風氣，新議員，仍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適應，需要時間建構新的議會文化。新一屆議會尚在「現在進行時」，這麼快便公開挑刺，甚至「懷緬過去」，有失公允，莫名其妙。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上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的致辭中，指出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強調要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

不管什麼人，對政府以至議會有意見都不奇怪，只要是為香港好、出於善意都應該聽，但如果不顧效果、不分場合、不理身份講一些不負責任的話，就不值得鼓勵。新時代下的香港從社會各行各業，到特區政府、立法會，都必須積極求變才能開闢發展新道路，要「說新話、幹新事」，就不能沉浸在過去。尤其現時外部勢力仍無所不用其極地試圖打擊香港，香港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作為立法會議員，更應以身作則，為良政善治多作積極貢獻。

習主席訪歐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知微篇
周八駿

2024年5月5日至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法國、塞爾維亞、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5年前，2019年3月21日至26日，習主席對意大利、摩納哥、法國進行國事訪問。3月23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習主席對時任意大利總理孔特說，「我們對時間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為計。」

當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進入美國對中國發起「新冷戰」階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人類近500年格局的調整，疊加二次大戰結束以來近一百零年格局的調整，再疊加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格局的調整。三個層次格局調整，中美關係皆是關鍵。

習近平主席說「我們對時間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為計。」我理解，是指我們中國人明白，我們所承擔的是自己國家和全人類的崇高歷史使命和重大時代責任。

相隔5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發生了新的更深刻更複雜變化。概括起來就是，從5年前特朗普政府代表美國向中國發起「新冷戰」演變為歐洲和中東的「熱戰」與美國加快加強推進對中國「新冷戰」相互影響，人類前途和命運，面對空前嚴峻的挑戰和抉擇。

全球安全面臨空前嚴峻挑戰

5年來，針對人類前途和命運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和抉擇，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

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針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結束後全球經濟恢復和發展所遇到的挑戰和抉擇，提出全球發展倡議。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約2個月後，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題為《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緊接着，3月15日習主席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題為《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的主旨講話，提出全球文明倡議。

為什麼全球文明倡議與全球安全倡議聯袂而至？因為全球安全所面臨的空前嚴峻的挑戰

和抉擇，歸根到底是人類文明的存續和發展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和抉擇。

進入2024年，俄烏衝突加劇惡化，戰火很可能向歐洲蔓延；巴以新一輪衝突演變為第六次中東戰爭，擴大的勢頭難以遏制。5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網站發表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該周刊專訪內容。馬克龍悲觀地稱，「一種文明是會死亡的。（A civilisation can die）」

面對世界風雲變色，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承諾和擔當堅定不移。2024年4月26日，習近平主席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重申，中國看待世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東西文明合作應對各種風險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追求人類不同文明和平共處、相互欣賞、相互吸引、美美與共。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大國競爭不是這個時代的底色。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方向和結局，取決於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方文明等，能否在21世紀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背景下，合作應對人類面臨的空前嚴峻的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挑戰。在如此史無前例的歷史和時代使命面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爭端和各國國家利益的分歧，黯然失色。

中國重視歐洲，重視法國，因為歐洲是基督教文明亦即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法國是其中一個重鎮。

2024年5月5日，習近平主席抵達法國巴黎奧利國際機場發表書面講話，明確宣示——「作為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國和法國長期以來相互欣賞、相互吸引。法國啟蒙思想家很早就開始研究中華文化；中國人民也對伏爾泰、狄德羅、雨果、巴爾扎克等法國文化巨擘耳熟能詳。60年前，中法兩國突破冷戰藩籬，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60年來，中法關係始終走在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前列，為國際社會樹立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典範。」

習近平主席同馬克龍總統的雙邊會談，同包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中法歐三方會晤，以及對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的訪問，所貫穿的是，東西方兩大文明必須合作應對歐洲和全球的地緣政治、經濟風險。

資深評論員、博士